# 经济全球化和落后国家的经济发展困境

## ——理论、机制及启示

于春海*

【摘要】针对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遭遇的经济发展困境，本文通过分析新古典增长理论和新增长理论之间的差异，以新增长理论中生产过程和要素收益率特征的变化为理论基础，探询要素反向流动、全球化集聚效应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困境之间的内在联系。从中发现，全球化进程中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困境与技术内生化、市场机制自发作用和制度因素之间存在密切联系。

【关键词】新增长理论、内生化、要素反向流动、集聚效应、经济发展。

### 一、问题的提出：理论和现实的差距

过去的半个多世纪中，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发展过程影响最为深远的一大趋势。主流观点认为在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下，基于各国比较优势进行分工、合作和经贸交往，能够为参与国际分工的国家带来各种各样的静态和动态利益，从而为其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提供动力。这是经济全球化的利益所在，也是众多落后国家参与经济全球化的目的所在。

支撑这种观点的是主流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逻辑。主流经济学认为自由市场机制不仅具有静态的效率优势和社会福利效应，还能够通过要素流动、市场竞争、学习效应等机制推动经济发展[1]。对于落后国家来说，其经济发展过程往往受制于国内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的匮乏状态。依据新古典主义的理论逻辑，要素存量与要素报酬是成反比的。因此，资金、技术等要素在落后国家具有潜在的高收益。如果能够置身于全球市场之中，在自由市场机制的作用下，落后国家不仅能够吸引到他们想要的资金和技术，而且还能把这些要素和国内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最有效地组合和利用起来，这样就能够实现经济的长期发展。在新古典理论的理论逻辑中，要素和产品在市场机制调节下的自由流动是实现经济发展的关键。落后国家只有打开国门、参与经济全球化，才能让这样的机制充分发挥作用，才能够最有效地利用经济全球化提供的发展机遇。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并且吸取了 60、70 年代拉

* 于春海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讲师。

[1] 目前，对于经济全球化问题的分析还没有一个明确的分析框架和理论基础， 人们一般都是直接引用国际经济学中的相关模型对全球化的利益和弊端进行分析。但事实上，国际经济学本身并没有完全统一。主流的国际经济学延续了新古典经济学的传统，推崇自由市场机制下分工、合作和竞争的福利创造效应，并以此为基础论证了国际经贸交往的利益；非主流的国际经济学则是从制度、政治经济学或者市场缺陷等角度展开分析，强调国际经贸交往过程中的收入分配效应。这些理论为分析经济全球化问题提供一个并不一致的理论基础。参见：Bordo, Eichengreen and Irwin(1999)，Krugman(1997)，Waltz(1999)

美国家“进口替代发展战略”[1]的失败教训，发展中国家走向“外向型发展战略”，希望通过加入世界经济的整体循环来促进经济发展，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如果这种理论逻辑能够在现实中成立，那么落后国家将“因落后而产生机会”。新古典增长理论所预言的有条件趋同假说就能够成立了[2]，落后国家就能够实现比先进国家更快的经济增长。然而，如果我们回顾一下世界经济在过去半个世纪中的表现，我们就会发现理论和现实之间的差距竟然如此之大！在过去几十年中，国际经贸交往迅猛发展，越来越多的落后国家打开了国门、融入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中。但是事与愿违，这些国家在过去几十年中虽创造出这样或那样的奇迹，但总体上与发达国家的差异始终存在。根据麦迪森等人的研究，从 1973 年到 1998 年的 25 年间，发达国家和亚洲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人均GDP的年复合增长率为 1.91%，而世界上其他 160 多个国家的人均GDP却是负增长的，每年下降 0.21%[3]。抛开发展中国家自身的失误不说，经济全球化进程并没有像古典或新古典理论所预言的那样，出现生产要素流向落后国家的趋势。相反，众多学者的实证研究表明，资金、技术等要素的“反向流动”现象[4]异常明显（Lucas,1990）[5]。

主流理论预言落后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因落后而产生机会”，这依赖于国际分工体系的扩散机制，即经济资源和财富从先进国家向落后国家的流动；然而在现实中，资源和财富的流动方向刚好相反，落后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因落后而失去机会”。这就是说，在现实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存在一种被人们忽视的“集聚效应”——资源和财富向先进国家聚积。理论和现实之间的差距使我们不得不反思经济全球化的理论基础和现实影响，以及落后国家如何面对这个由先进国家主导的、实践自由主义理念的经济全球化[6]。

## 二、理论分析思路：从新古典增长理论到新增长理论

从斯密、李嘉图时代开始，如何将人均收入的持续增长和边际报酬递减统一起来，一直

---

[1] 进口替代战略通常被认为是保护主义在落后国家的典型表现。

[2] 根据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基本结论，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人均产出）应该是趋同的，也就是说国别经济差距不应该持续存在。参见：Kaldor（1961），Maddison（1982），Romer（1986），Maddison（1982,2001）。

[3] 参见：麦迪森（2003）,118－123。

[4] 即从落后国家流向先进国家。

[5] 过去几十年中，国际投资的膨胀主要是发生在发达国家之间的。对于技术的流动，难以用一个明确的数量指标来衡量，但是一般来说，技术流动大多是以人为载体的，即所谓的人力资本的流动。从 1950 年到 1998 年，西欧国家吸纳了 2000 多万的移民，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吸纳了 3400 多万移民。（麦迪森，2003）落后国家人力资本的外流——即“智力外流”——隐藏在这些数据之中。

[6] 西方国家始于 20 世纪 70 年代的自由化改革以及随后冷战的结束、计划经济国家的转型和东亚国家的成功案例，为自由市场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效率优势提供了经验支持，也成为落后国家模仿的对象。这是 Friedman(1999)和 Kenichi(1990)所说的“失败者对成功者的模仿”。这就使得当前的经济全球化成为各国实

是古典经济学家最感兴趣、也是最令他们感到困惑的问题之一。斯密通过论证劳动分工带来经验和技能积累，指出劳动分工是生产率提高、进而经济长期增长的根本原因；他同时认为，“分工的程度总要受到市场范围的限制”。李嘉图则从土地边际生产力递减规律出发，得出经济增长最终趋于停滞的结论。这是任何人都不愿看到的结果，但从边际报酬递减出发，这又是无法回避的一个结果。这一困境对经济增长理论提出了巨大挑战，导致增长理论和发展理论的分离。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通过为经济增长指派一个外生的指数趋势项，回避了上述难题，但同时也回避了自身的根本目的，即为长期经济实践提供政策建议（Romer,1986）。经济增长理论在这一时期的发展实际上是回避了一些根本性问题，而专注于抽象的方法论研究和理论工具创新。

这一问题集中体现在索罗和斯旺所提出的新古典增长理论中。秉承古典经济理论的传统，新古典增长理论认为实物资本的积累是决定经济长期增长趋势的关键因素。长期中，在边际生产力递减规律和市场机制的共同作用下，经济终将趋向一个稳定的零增长均衡状态[1]。而实证研究表明，过去一百多年中世界整体存在持续而显著的增长（Maddison,1987;Romer,1986）。为了调和理论与现实的差距，新古典增长理论引入技术进步和人口增长两个外生因素，用这两个外生因素解释经济的长期增长。通过引入外生的技术变化和人口变化，传统增长理论把经济的持续增长现象纳入其基于边际生产力递减的分析框架中。这实质上是承认在经济增长中有一部分属于资本和劳动所不能解释的残差。通过对不同国家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人们发现，这一残差似乎已成为许多国家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在日本的经济增长率中，有 4 个以上的百分点是资本和劳动美法解释的；而在美国的长期经济增长数据中，也有一个以上的百分点属于残差部分（Maddison,1987）。然而，问题并没有就此结束。如果将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的根源归结为外生的技术或人口因素，各国经济增长情况应是收敛的，即各国经济增长率趋同。因为外生因素不是经济行为人决策的结果，也不受其行为的影响，应该是在世界范围内随机分布的，在长期中对各国的影响也应是相同的。也就是说，在理想情况下，不同国家的人均资本存量水平以及产出水平在长期中将趋同[2]。但实证研究表明，过去一个世纪中，经济增长并没有在世界范围内出现普遍趋同的趋势，实际情况是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增长速度明显趋同；而在发展中国家内部以及与发达国家之间，

---

践自由主义理念的舞台。

[1] 关于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具体内容和分析过程，参见：Solow (1956,1957,1970)，Swan (1956)。

[2] 所谓的理想条件，包括完善的市场、相同的生产技术、相同储蓄率和折旧率。新古典经济学在考虑长期增长问题时，把资本存量以外的影响产出水平的因素都当作外生变量。在不同的国家，这些外生变量就是随机发生的，而不是生产过程的结果，所以在长期中，不同国家在这些外生变量上没有系统性的差异。所

经济增长的差异始终存在并不断扩大（Summers and Heston, 1984; Maddison,1987）。因为新古典增长理论忽视了经济增长中的一些根本因素，它在试图调和理论和现实之间的矛盾时，必然引发出根多的问题和矛盾[1]。

可以看出，所谓的“理想条件”，对于新古典增长理论而言，都是外生变量。这些条件无法在其理论框架内得到合理解释，整个理论也无法就如何创造这些条件提出合理的政策建议。60 年代以后，随着世界范围内有关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的不断深入，更多的关于经济增长的规律性表现进入人们的视野，罗默在《长期增长理论中的资本积累》一文中，根据 80 年代麦迪逊、萨默斯以及赫斯顿等人对经济增长进行的国别比较和实证分析，总结出有关经济增长的其它五个特征，其中包括新古典增长模型中的要素投入不能全部解释产出的增长和劳动力向发达国家流动的倾向[2]。如何解释这两个特征成为 80 年代以后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主线。在此基础上，80 年代以来形成和发展一种不同与新古典增长理论的新增长理论。新增长理论在方法论上并无太多的创新，但它通过把知识、技术等因素引入生产函数，以新的解释变量对经济增长做出了全新的、更全面的解释。新增长理论的基本思路将是将传统增长理论中的种种外生变量内生到模型中，在此思路下出现的种类繁多的模型，最主要的区别是这些变量进入模型的方式和程度。以知识为例，一种处理方法是将其附着于资本、劳动力等有形要素上，通过改变这些要素的质，增加其有效量；另一方法是使知识以独立变量的形式进入模型，即直接作为与资本、劳动力并列的生产要素；第三种则是前两种方法的综合。在知识内生化以后，新增长理论进一步认为，知识是投资和生产活动的产物，因此，知识积累是理性个人或厂商最大化选择的结果。上述处理方法可以归结为两点：一是生产函数的变化，二是约束函数的变化（即新要素的来源）。这样，生产决策就不仅是普通产品投入选择问题，更包括知识生产的投入选择。将这两种生产过程综合在同一的最大化决策中，新增长理论的出了不同于传统增长理论的结论[3]。

根据阿罗、卢卡斯和罗默等人对知识特征的描述，知识、技术、经验和人力资本等被界定为具有部分竞争性和部分排它性的生产要素（Lucas,1988;Romer,1990）。卢卡斯认为竞争性程度的不同是人力资本和其它知识的主要区别，人力资本是凝结在人体上的特殊知识，在

---

以，人均产出水平最终必然会趋同。

[1] 早在 60 年代初，卡尔多就经济增长问题总结出六条“公认事实”，要求经济增长理论能够对这些事实进行解释、检验和判断。其中，生产率的增长率没有表现出下降的趋势以及各国生产率的增长率存在很大差异(Kaldor, 1961)，对传统增长理论的合理性提出了挑战。

[2] 参见：Romer (1986, 1990, 1993, ), Barro and Sala (1995), Maddison (1982), Summers and Heston(1984)。

[3] 相关研究参见：Kaldor (1981), Helpman and Krugman (1985), Krugman (1986), Romer (1986,1990), Lucas (1988), Helpman (1992), Renelt (1991), Shaw (1992), Siebert (1991), Verspagen (1992), Young (1993)。

同一时间内只能在一个生产过程中发挥作用，因而具有竞争性；而其它大部分知识却可以同时为许多生产过程利用。部分排他性则是由知识自身的特点和经济、法律制度共同决定的，类似于一种准公共产品。根据上述特征可以将知识分为不同的类别，各自的积累途径也有所不同。基础性科学技术由于面临较大的外部性，由政府支持研究和开发；新的生产技术、生产工艺等发明创造，因为可以较好地实现排他性，所以主要来自私人部门的研究开发；实践经验则主要是在直接的投资和生产活动中，通过“干中学”效应进行积累。

在这些新要素进入生产过程以后，生产的动态特征发生了变化。在罗默的技术内生模型中，要素积累的动态路径依赖于要素的初始存量。也就是说，初始存量水平越高，积累速度越快。而产出增长率也与要素的初始存量成正比，即要素初始存量越大，产出增长越快。这一结论与新古典增长理论的结论刚好相反。经济的长期增长摆脱了对人口增长和外生技术进步的依赖[1]。在卢卡斯的模型中，人力资本和实物资本既具有内在效应、也具有外在效应，两者结合在一起，导致要素的边际收益呈现递增的趋势[2]。这样，要素积累路径就不会趋向新古典理论所说的“稳定的零增长均衡状态”。这些理论模型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了长期中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对世界经济整体的长期持续增长给出更为合理的解释，也在一定程度完成了罗默所说的经济增长理论的核心任务——为经济实践提供政策建议[3]。通过对技术、知识、人力资本等新要素进行内生化处理，新增长理论解释了经济的长期增长问题。作为一个中间环节，这些要素的收益率规律发生了变化，不再满足新古典理论所说的“边际生产力递减规律”。这种变化对于市场机制的作用结果——要素流动方向——具有重要影响。

## 三、对于全球化集聚效应和要素“反向流动”趋势的初步解释

经济全球化作为生产社会化在全球层次上的表现，现阶段主要表现为全球经济的市场化，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成为调控生产要素流动的主导形式。这实际上就是将不同的国家极其经济行为主体置于一个统一的市场中进行竞争。落后国家参与经济全球化的目的是利用外部资源和市场，在参与国际分工的过程中推动经济发展。对特定国家来说，参与全球化意味着市场范围的扩大，从斯密的逻辑出发，这自然有助于克服“分工程度所受的市场范围的约束”，进而在不断深化的分工体系中提高生产力、促进经济发展和经济繁荣。果真如此吗？

---

[1] 具体的论述参见：Romaer (1990)。

[2] 参见：Lucas (1988)。

[3] 为了促进经济的长期增长，最重要的不是实物资本的积累，而是知识、技术和人力资本的生产、积累和传播。后者是政府的职能所在。参见：Kelly (1996), Rankin (1998)。

从新增长理论的分析逻辑中可以看出，由于知识、技术和人力资本等因素以双重身份进入生产过程——既是生产的投入又是生产的结果，这些要素的收益率特征发生了变化，使得经济增长过程中的种种变量的动态过程呈现出路径依赖的特征，即初始存量影响经济的长期发展。新增长理论的分析过程是非常抽象的，在罗默和卢卡斯等人的论述中，为方便用数学语言进行分析，还对生产函数和变量进行了非常苛刻的界定。由于经济关系的复杂性和经济变量的含义过于宽泛，新增长理论给出的一些数学分析并不是精确的数量关系，它仍然只是一种定性分析。从这一点出发，新增长理论是可以成为一种有用的分析思路或工具，对经济增长中所表现出的一些因果关系提出合理的解释。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可以用新增长理论的基本逻辑来探讨落后国家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中面临的增长困境。

市场竞争首先表现为对要素的竞争，通过利益机制使得要素向高收益地点聚集。在新增长理论中，要素的收益率特征不同于传统理论所说的，市场机制的作用结果必然会偏离传统理论的预言。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对比中，前者的优势不仅体现在经济实力雄厚、经济结构合理等有形的总量指标上，更重要的是一些无形的优势，特别是在那些对一国经济长期发展潜力和综合竞争力有重要影响的高级要素方面[1]（Porter,1990），发达国家的优势更为明显。据世界银行的统计，目前世界上 80%的开发和研究以及类似的科学出版物来自工业化程度较高的国家，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由于基础薄弱、技术水平底，自主科研和开发的能力不足，导致知识和技术的存量较少，这又影响其进一步研究和开发的能力，因此主要依靠发达国家的知识和技术流入。但是在市场中利益机制的自发作用，将使得发展中国家的这一愿望难以实现。技术、知识、人力资本等因素的边际生产力，进而其报酬，都依赖于初始存量水平。发达国际和发展中国家在初始禀赋条件上的差异直接表现为生产中要素边际生产力的差异，然后演变为市场收益的差异。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这些要素出现所谓的“反向流动”趋势，是很正常的结果。

此外，根据Young（1993）等人的分析，技术等要素在生产过程中收益率特征的变化依赖于技术内生化的程度[2]。由此，，我们要看一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将技术内生化方面，谁更有优势。技术内生化受到学习约束和发明约束。厂商在将基础科研的成果转化为生产技术并应用于生产时，面临三方面的约束：首先是基础科学研究的进展限定了生产技术改进的

[1] 根据波特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国家的竞争力状况取决于要素禀赋、相关和辅助产业、国内市场需求状况、企业的策略、结构和竞争。其中要素禀赋包括基础要素如自然资源、气候、地理位置、人口等，和高级要素如通讯设施、科研机构、知识、技术、高技术劳动力等。波特认为，高级要素是个人、政府和企业投资的结果，它不仅可以加强和扩展由基础要素决定的初始优势，更是影响一国长期竞争力的关键。

[2] 从一般的科学知识到生产过程中可以利用的生产技术，两者是不一样的，中间有一个很长的转变过程。简单地说，就是从实验室到企业之间的“距离”。这就是所谓的“技术内生化的程度”。

空间，即最大可能性；其次，生产技术的创新及其应用受制于国内市场规模和特点（Porter,1990），这决定了潜在的收益；最后，任何一项新技术，要形成现实的生产力，必须由相应的应用新技术和新设备的经验，这取决于过去的生产经验在多大程度上适用于性技术下的生产，即生产技术进展的连续性。在前两个方面，发达国家的优势明显。基础科研方面的差距已是人所共知；市场的规模及竞争状况也同样如此。这就使得发达国家在发明创造的根本潜力方面优于发展中国家。在经验方面，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层次基本仍处于初期工业化阶段，即便是那些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工业化过程也远没有达到成熟阶段。在以前的投资和生产过程通过“边干边学”所积累的经验，主要是与低层次的工业化生产技术相适应的。新型的生产技术难以很快形成现实生产力，并在市场中获取竞争优势。这第三方面的差距是现阶段发展中国家获取新技术的最大障碍。因为，随着 80 年代以来新技术革命的深入发展，在发达国家内部，生产技术的创新和应用呈加速发展态势，激烈的市场竞争要求新技术必须在最短时间内投入应用，并形成现实生产力。否则，一旦出现更新的技术。原有的技术将急剧贬值，有可能导致无法回收研究和开发中投入的巨额成本。这几个方面的差距共同导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将技术内生化方面极不对称。后者在一定程度上难以将技术内生到生产中。这进一步强化了要素收益在两类国家之间的差异。

上面的分析基本是属于比较静态的分析，并没有考虑经济动态发展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即没有考虑对未来的预期。在现实中，要素追逐的高收益应该是经风险和预期调整的收益。对经济发展前景的预期是对收益进行调整时必须考虑的关键因素之一。而经济增长率是受制于初始要素禀赋条件和制度条件的，这样，在整体上对发达国家的预期应高于对发展中国家的预期。发达国家在竞争生产要素方面的优势得到自我强化。至此我们可以看出，利用新增长理论所提出的生产过程的新特点，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将带来一个完全不同于传统理论的结果。由于技术、经验和人力资本等要素是内生于生产过程中的，其收益率依赖于初始存量。在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下，发达国家资金、技术、知识、经验乃至制度等方面的初始优势体现为较高的收益率，结果是更多的资金、技术和人才流入。在全球化进程中，发展中国家并不能利用市场机制顺利地吸引外部资金和技术等要素的流入，相反，这些要素更可能是流出的。在这种背景下，其经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变成一个空中楼阁。因此，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经济全球化的聚集效应、资源反向流动和落后国家的经济发展困境都是市场机制自发作用的结果，它具有自我强化的趋势，因为市场竞争是以给定的初始禀赋条件为出发点，其效率原则不含有任何纠正初始机会不平等的意思。

此外，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到底会产生什么的结果，还要受制于特定的制度安排。经

济全球化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经济活动向全球的自发扩张，可以说这是游戏的全球化，这就必然要求游戏规则也要全球化，即为全球性经济活动提供全球性的规则。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推进，各国经济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向纵深发展，但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是：这种依赖关系是极不对称的。经济全球化在现阶段的不对称状态决定了现阶段全球经济活动的“游戏规则”必然也是不对称的。发达国家主导着国际经济制度的演变。在前文的论述中我们已经指出，在自由市场机制作用下要素的反向流动具有自我强化的特点，这就等同于发达国家的优势地位可以在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下得到强化。所以，国际经济制度在近年来的变革基本是以自由化为原则，以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为目的，这是不难理解的。从本质上说，任何一种制度安排都必须具有足够的逆向行为能力，以便从相反方向制衡其规制对象的行为。但国际制度的不对称及其对自由竞争的追逐，使其不能实现应有的制衡和规范市场的作用。这就助长了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资金、技术、人才等要素向发达国家聚集的趋势得以加强。问题并没有到此结束，在要素流动的背后还有一个利益分配问题，如何分配生产的结果。现时的国际制度同样将自由市场原则贯彻于国际分工利益的分配之中，其结果是在资源向发达国家聚集之后，出现财富向发达国家的聚集。这可以说是自由市场机制发生作用的必然结果，并得到国际制度的强化[1]。

## 四、进一步的思考和启示

从新增长理论的逻辑出发，可以对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中面临的独特问题进行初步的解释。当然新增长理论的逻辑并不是绝对完善的。新增长理论沿用了主流经济理论的均衡分析法，回避了对市场非均衡状态的调整过程的分析，所以对市场非均衡状态以及市场波动性缺乏解释能力[2]。在实践中，发展中国家面临普遍的社会和经济变革，他们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进程通常与国内经济结构调整和制度变革的进程交织在一起。在这样一个改革和开放同步展开的进程中，市场机制的运作过程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变革中的政府又会对市场机制施加什么样的影响？两者结合以后会出现什么结果？这些问题在本文的分析框架内还难以给出合理的说明。这应该成为进一步的研究方向。

虽然存在诸多问题，但新增长理论的逻辑已经明显地体现在国际经验中。80 年代以后，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所展开的经济调整，在整个政策导向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

[1] 参见：雷达、于春海，2000。

[2] 罗默等人认为，在收益非递减和存在外部性的条件下，市场竞争依然能够趋向稳定均衡。相关参见：

90 年代以前基本是以自由化和市场化为改革的导向，虽然在当时所谓的“华盛顿共识”中也包含了很多自由化以外的成分，但在发展中国家得到充分实践的主要是市场导向的自由化改革。90 年代以后，经历了几次大的经济动荡以后，人们开始反思发展中国家的开放战略。在强调开放和自由化的同时，国内宏观经济调整和制度变革的要求越来越受到重视，在目前甚至有这样一个“共识”：发展中国家要想在开放经济背景下取得成功，宏观经济调整和制度变革是前提条件[1]。在这方面，最重要的是构建宏观经济的制度基础，为充分发挥自由化改革的功效创造必要条件。包括完善法律制度、改革教育体系、调整政府的职能和宏观政策的目标[1]。要求政府建立国家创新体系，鼓技术创新并推动新技术的扩散，为R&D提供税收激励，鼓励风险投资，鼓励产业集群的发展。这些调整和变革将有助于改善发展中国家在初始要素禀赋和制度等方面的条件，为他们走出经济发展困境创造条件。

参考文献：


1.Barro, Robert,J. and Martin, Sala,I, *Economic Growth,* McGraw-Hill,Inc, 1995.

2.Bordo Michael D., Barry Eichengreen, and Douglas A. Irwin, Is globalization today different than globalization a hundred years ago? NBER Working Paper 7195, June 1999.

3.Chiang,Alpha C., *Elements of Dynamic Optimization*. McGraw-Hill, Inc., 1992.

4.Daniel Drache, The return of the public domain after the triumph of markets, in *The Market vs. the Public Domain: After the Triumph*, London, Routledge, 2001.

5.Friedman, Thomas L., *The Lexus and the Olive Tree*. New York: Farrar, Straus, Giroux, 1999, p.28.

6.Georgescu-Roegen, N. *The Entropy Law and the Economic Proces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1.

7.Henry, J., On equilibrium, *Journal of Post-Keynesian Economics*, VI(2) Winter, 1983/84, 214-229.

8.Kevin Kelly, The Economics of Ideas, *Wired*, Issue 4, 6 June 1996.

9.Keith Rankin, The "Growth Illusion" vs. "New Growth Theory", 8 February 1998.


---

Georgescu-Roegen (1971), Kornai (1971), Henry (1983/84), Romer (1986)。

[1] 参见：Williamson (1993,1999, 2003), Naim (1994), Danie (2001), Stiglitz (2002)。

10. Kaldor, N., The Role of Increasing Returns, Technical Progress and Cumulative Causation in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Economic Growth, *Economic Applique*, 34(4), 1981, 593-617.

11. Kornai, J., *Anti-Equilibrium*, New York: American Elsevier Publishing Company, 1971.

12. Krugman, Paul, "Competitiveness: A Dangerous Obsession." In *The New Shape of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W.W. Norton and Foreign Affairs, 1997, p.67.

13. Kenneth N. Waltz, Globalization and Governance, James Madison lecture, www.apsnet.org., 1999

14. Lucas,Robert E., On the Mechanics of Development Planning,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22,1, 1988.

*15.* Lucas,Robert E., Why Doesn't Capital Flow from Rich to Poor Countri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80,* 1990.

16. Maddison, A., *Phase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17. Naim, M., Latin America's Road to the Market: From Macroeconomic Shocks to Institutional Therapy, San Francisco: ICEG, 1994.

18. Ohmae, Kenichi, *The Borderless World: Power and Strategy in the Interlinked Economy*. New York: Harper Business, 1990, p.152。

19. Porter M.E., *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Nations*. New York: Free Press, 1990.

20. Romer,Paul M., Increasing Returns and Long-Run Growt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94,5, 1986.

21. Romer, Paul M., Endogenous Technological Chang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98,5, 1990.

22. Romer, Paul, Increasing Returns and New Development in the Theory of Growth., in *Equilibrium Theory and Applications: Proceedings of the 6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in Economic Theory and Econometrics*, edited by William Barnett et al. 1991.

23. Romer, Paul, Economic growth, in David R. Henderson (ed.) *The Fortune Encyclopedia of Economics*, Warner Books. 1993.

24. Summers, R., and A. Heston, Improved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s of Real Product and Its Composition: 1950-1980. *Review of Income and Wealth*,30, 1984.

---

[1] 宏观政策不能只针对经济增长，要兼顾增长和公平；同时还要强化强化社会政策、收入分配政策。

25. Solow, R. M., A Contribution to 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70 (1), 1956, pp. 65-94.

26. Solow, R. M., Technical Change and the Aggregate Production Function,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Vol. 39, pp. 312-20, 1957.

27. Solow, R. M., (1970) *Growth Theory: An exposition*. 1988 edi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8. Stiglitz Joseph, Challenging the Washington Consensus, *The Brown Journal of World Affairs*, Vol. IX, Issue 2, 7 May 2002.

29. Swan, T. W., Economic Growth and Capital Accumulation, *Economic Record*, Vol. 32 (2), p.334-61, 1956.

30. Williamson, J., Democracy and the Washington Consensus, *World Development* Vol. 21, No. 8, 1993, 1332-1333.

31. Williamson, J., What should the bank think about the Washington Consensu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World Bank's PREM meetings, July 1999.

32. Williamson John, An agenda for restarting growth and reform, in *After the Washington Consensus*,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03, 2-20.

33. Young, A. 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Progress, in Arrow, K.J. and Scitovsky, T. eds. *Readings in Welfare Economics*, Homewood, Ill: Irwin Publishers, 1993.

34. Young, A., The Tyranny of Numbers : "Confronting the Statistical Realities of the East Asian Growth Experienc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Vol.110, 1995.

35. 『美』罗伯特 J. 巴罗：《现代经济周期理论》，商务印书馆 1997 年版。

36. 雷达、于春海："经济全球化影响的制度经济学思考"，《世界经济》2000 年 4 月。

37. 『英』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年。